

## 從歷史的角度看東南亞華人網絡

丘立本

戰後東亞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和華人在經濟上的成就，使人們對海外華人經濟網絡產生了濃厚興趣。本文從世界歷史的角度，考察東南亞現代華人網絡的演變，並對國外傳媒的有關議論提出自己的看法。

經濟網絡與商品經濟有著密切聯繫。歷史上商品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和民族如古代的地中海地區和那裏的腓尼基人、希臘人，中世紀歐洲的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古代和中世紀東方的中國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等都曾建立過自己的商業網絡。資本主義是在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情況下出現的，在資本主義時代，經濟網絡日趨普遍，英、美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和民族，從十九世紀初起，便逐漸將他們的經濟網絡擴展到全球各地。現代海外華人網絡就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由中國移民在中國境外建立起來的。

中國人移居國外的歷史雖然很長，但大規模遷移海外卻是發生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事情。據不完全統計，從1840年鴉片戰爭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的一百年裏，中國人出國人數將近1000萬，足跡遍及五大洲數十個國家。這種現象的出現，與中國內部的天災人禍有直接關係，也與資本主義在世界各地的擴張密切關聯。就在中國移民大規模出國的同一時期，歐洲有近6000萬移民湧向南北美洲、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印度約有3000萬移民被遷移至南亞、東南亞和南非一帶。由此可見，中國人口的大規模外遷不是孤立的現象，而是一種國際現象，中國移民是世界移民大軍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勞動力在國際勞動市場中的流動，是與商品、資本的國際流動密切相關的。<sup>1</sup>

由於中國經濟落後，政府腐敗，被資本主義洪流卷到世界各地的中國移民完全得不到中國政府的幫助，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組織自助團體，和衷共濟，團結自救。十九世紀的中國還是個宗法社會，宗族是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核心，剛剛離開土地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自然帶著這種社會關係和傳統的觀念，依照他們所熟悉的社會組織模式在移居地建立自己的新團體。中國移民的絕大多數來自廣東和福建兩省，那裏方言眾多，彼此難以溝通，因此移民來到各移居地後便形成了以方言為基礎的群體即所謂的幫，並在幫內建立了以地緣、血緣為紐帶的同鄉會（會館）和宗親會組織。東南亞華人中主要的幫有廣東幫、潮州幫、福建幫、客家幫和海南幫等。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宗鄉組織在海外華人中已十分普遍，僅新加坡一地就有姓氏宗親組織60個，同鄉會組織64個，這些宗鄉組織成了早期華人經濟網絡的基礎。<sup>2</sup>

宗鄉組織帶有濃厚的宗族色彩，怎麼成為了華人發展資本主義的經濟網絡的基礎呢？這是因為，和國內的情況不同，這些組織是由被捲入國際勞動市場的中國移民，為了在國際競爭中求生存而建立的，其主要成分是脫離了封建土地關係的農民和小手工業者，他們雖受傳統觀念的影響，但國際移民的地位和小生產者的自發勢力往往使他們能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去尋自身的出路。因此，這些組織在國外建立時其性質和功能便開始發生變化。

---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此文曾發表於《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1-7頁。此次刊載時，因篇幅關係，略加刪節。For an English version see Qiu Liben, "The Chinese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Chan Kwok Bun (ed.)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 State, Economy and Culture*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2000), pp. 193-206.

<sup>1</sup>游仲勳：《東南亞之華僑》（亞洲經濟研究所，1983），第11-15頁；參看丘立本“從世界史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國移民問題芻議”，《世界歷史》（1986），第3期，第1-7頁。

<sup>2</sup>鐘臨傑，“對新加坡華人會館的功能改變的反思”，《亞洲文化》第14期（1990），第61頁；參見Cheng Lim Keak, *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5).

例如，海外移民多為單身漢，不能建立真正血緣的組織，只能建立單姓或數姓聯宗的宗親組織，如包括了十八姓的龍崗親義總會。又如由於真正來自同鄉的移民不多，海外許多同鄉會組織不得不將數縣乃至數省的人包括進去，如“三江會館”包括江蘇，浙江和江西三省。可見海外的宗鄉組織是移民為了互助自救的實際需要而建立的，實際上是沒有多少血緣關係的血緣組織，是失去土地，離開故土的地緣組織，其任務是幫助“新客”，解決食宿，工作，貧病，安葬，祭祀等難題，舉辦其他社會公益事業，調解內部糾紛等。再如傳統制度下商業資本的出路，一是購地，二是做官，因此會館多變為“仕商並容兼以在京師收容應試鄉舉子而變為試館”。海外華商無權購地，也不能做官，但與國際市場有著聯繫，會館便成為華商集會的重要場所和後來成立的業緣組織“中華商會”的基礎。由此可見，海外宗鄉組織雖仍帶有宗族主義的色彩，但由於處境不同，性質、功能以及組織結構內部發生了重大變化，就有可能成為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網絡的基礎。

當然，這僅是一種可能性而已。並不是在海外建立了宗鄉組織的地方，華人經濟就一定能快速發展，華人資本就能迅速形成。事實上，美洲華人早在1849年就成立了“岡州會館”，“中華公所”，隨後又出現“六大公司”，“江夏堂”、“隴西堂”，“客商總會”和“勝公堂”等地緣、血緣、業緣組織。中美洲、南美洲和歐洲華人也先後建立類似的團體，但那裏的華人都未能在經濟上取得顯著的成就，只能在狹隘的唐人街裏活動。因為在那裏，中國移民不但人數少而且遇到了來自歐洲移民的激烈競爭，後者不但得到本國政府的支援，而且商品經濟意識遠比中國移民強，社會經濟組織也遠比中國移民的先進。還在17世紀，英國移民便已廣泛利用家族親友的網絡把整個新英格蘭和美洲殖民地的港口城市聯接起來。<sup>3</sup>到19世紀中葉，他們早已越過依靠家族網絡階段，進入運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網絡與歐洲建立“大西洋經濟”的階段了。1854年，美國摩爾根財團創始人朱尼厄斯·摩爾根（Junius Morgan）親自從波士頓到倫敦，建立了美洲與歐洲盎格魯撒克遜人間的金融聯繫，引進大量英國資本以支持美國的鐵路建設。據統計，1870-1914年間，美國吸收了英國對外投資的55%-60%。<sup>4</sup>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當來到新大陸開礦與築路的中國移民還在依靠“六大公司”爭取自身生存的基本權利的時候，在歐洲受迫害而遷到美國洛杉磯的猶太人已組建了現代銀行。十年之後，他們已進入美國最富有者的行列了。<sup>5</sup>顯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移民根本無法在經濟上和歐洲移民競爭，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歐洲移民利用現代政黨和工會組織迫使州議會和聯邦議會通過一系列排華法令，禁止華人入境，唐人街華人的處境就更加困難了。<sup>6</sup>

在東南亞，情況卻大不相同。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開通和輪船、海底電線的使用，大大縮短了歐洲與亞洲的距離。但這裏的歐洲移民人數甚少，西方殖民者為了獲取東南亞的原料和開發市場，不僅需要輸入大量亞洲勞動力從事原料生產，而且需要數量可觀的亞洲仲介商人來替他們收購原料和銷售歐洲工業產品。當地居民多從事自然經濟活動，很少人經商。麻六甲在歷史上曾是東南亞貿易的中心，也是東南亞當地正在形成的商人階層的搖籃，但該地1511年被葡萄牙人武裝佔領，1641年又被荷蘭攻佔，1824年又落到英國手裏，

<sup>3</sup>Ivan Light, "Immigrants and Ethnic Entreprises in the North Americ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984), vol.7, no.2, p.205.

<sup>4</sup>Ron Chernow, *The House of Morgan: An American Bank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Finance* (N.Y.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0), cited from Kotkin Joel, *Tribes: How Race, Religion and Identity Determime Succes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Ramdon House.1993), pp.85-86; Brinley Thomas, *Migr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quoted from Joel Kotkin, *Tribes: How Race, Religion and Identity Determine Succes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Romdon House, 1993), pp.85-86.

<sup>5</sup>Max Vorspan & Lloyd P. Gartner, *History of the Jews of Los Angeles* (San Marino: The Huntington Library, 1970), cited from Kotkin Joel, *Tribes*, p.58.

<sup>6</sup>沈已堯, <<海外排華百年史>>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5), 第 25 頁。

當地商人遭到這些劫難，再也難以生存。曾在東西貿易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的印度商人和阿拉伯商人，也因印度淪為英國殖民地和蘇伊士運河開通後東西貿易為歐人所控制而受到嚴重削弱。相比之下，中國移民的商品意識雖比歐洲移民差，卻比東南亞當地居民強，<sup>7</sup>中國移民的宗鄉組織雖不及歐洲移民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組織先進，卻不比當地居民的社會經濟組織差。這一切給了大量遷入的中國移民一個進入商業領域的難得的歷史機遇。而東南亞華人宗鄉組織則為中國移民進入流通領域和生產領域提供諸多便利，使他們比當地居民和其他亞裔居民更易於獲得發展所需的勞動力、資金、資訊、信用和市場。這樣，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東南亞首批現代華人企業家，便依託這類宗鄉組織形成的網絡，先後登上了東南亞各國的歷史舞臺。<sup>8</sup>

應當指出，本世紀初，以幫為基礎的華人網絡，其範圍十分有限。因為各幫所建的學校、錢莊、墳地和其他福利事業只為本幫成員服務。顯然，這種帶有排他性的幫網絡，不利於華人內部的團結，更不利於華人經濟的發展。因此，從1904年起，各地開始建立“中華商會”之類的業緣組織，作為聯繫和協調各幫關係的高層機構。其他業緣組織也隨之紛紛出現。1911年的辛亥革命激發了華人的民族主義感情，增進華人間的認同感，各地華人學校紛紛推廣國語教學，消除方言障礙。各種現代政治、文化和福利團體的成立促進了華人之間的交往，使華人網絡逐漸聯成一片，推動了華人經濟的發展，密切了他們與祖國的聯繫。

從本世紀初起，東南亞區域內部生產日益專業化，形成了專門出產錫和橡膠等歐美國際市場急需的工業原料的新興產業帶和專門供應這一產業帶勞工生活必需的大米等食品供應帶。前者以馬來亞的大型橡膠種植園和錫礦聞名於世，後者以曼谷、仰光和西貢三大米市而著稱。區域內勞動分工的加強，保證了國際市場的需求，同時也促使區域內部市場日趨活躍。西方各大企業集團壟斷著工業原料和工業製品的洲際貿易，無暇顧及區域內部的市場。華人商貿網絡便越出國境，擴大到東南亞全境。

二戰結束後，東南亞各國先後獲得獨立，為民族經濟的發展開闢了廣闊前景。在殖民時期，華人資本作為當地民族資本先驅和骨幹，雖然有了某種程度的發展，但受到嚴重的壓制。例如，在華人占總人口36%的馬來亞，直到1953年，以英國為主的西方大壟斷公司仍控制了60-75%的錫和橡膠的生產，65-75%的出口貿易和60-70%的進口貿易(1955)，華人只能充當中、小仲介商。<sup>9</sup>殖民統治的結束，無疑對包括華人資本在內的民族經濟的振興具有重大意義。然而，戰後初期，政局動盪，剛獨立的東南亞各國對於如何改變殖民時期形成的畸形經濟，全面發展獨立自主的民族經濟還處於摸索階段，華人企業也面臨著如何適應民族經濟發展的需要和國際分工新特點的難題。這項工作由於當地政權普遍實行扶植原住民經濟，限制，排斥華人經濟的政策而變得更加複雜和艱巨了。面對艱難形勢，各地華人利用了原有的網絡，從受到限制的流通部門轉移到少受限制的生產部門，使企業多元化並分散風險。一些企業則將部分資金轉移到比較安全的新加坡和香港，試圖尋求新的出路。1964年到1967年，從東南亞流入香港的資金每年多達10億港元(約2億美元)，成了香港經濟起飛的資金來源之一。<sup>10</sup>在華人受到嚴重衝擊的地方，出現了再移民的現象，許多華

<sup>7</sup>Maurice Freedman, "The Handing of Money: A note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Sophistic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Man*, vol.56 (1959): 64-65.

<sup>8</sup>Linda Y.C. Lim & Peter Gosling, eds.,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and Ann Arbor: Maruzen and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3), pp.2-8; 參看丘立本“從歷史角度看東南亞華人宗鄉組織的前途”，《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9-14頁。

<sup>9</sup>J. J. Puthuchery,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the Malayan Economy in the Malayan Economy: A Study of the Structure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and its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Industri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Co-operative Bookshop LTD. 1979), pp.13-14.

<sup>10</sup>Wu Yuan-li and Wu Chun-hsi,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e,

人被迫遷往鄰國或歐美等地，一些因受配額限制，不能上大學的華人青年，不得不到歐美等國留學。這種排斥華人的情況直到各國全面實施進口替代型和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新戰略後才有所改變。

新戰略的實施，關鍵在於調動本國私人資本，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開拓新的市場。東南亞各國國內私人資本主要是華人資本，過去那種扶植原住民而歧視華人的經濟政策顯然已不符合新發展戰略的要求。從六十年代起，一些國家開始改變其對待華人資本的態度，由原先的排斥，歧視政策轉而實行限制，利用和保護政策。各國華商對官方這一新政策迅速做出善意的回應，將原先流往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遊資逐漸調回本國，還把港、台、新、日以及歐美資本和技術引進本國，促進了本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外國資本一般都更願意選擇有經商經驗的華人資本為合作對象，華人資本也願意利用外國資金和技術從流通領域逐步轉向生產領域特別是製造業。這樣，進入七十年代後東南亞華人網絡便逐步適應本國民族經濟發展的新要求和國際分工的新特點，實現了由原先“仲介商”型的商業網絡向著“資金技術引進”型的工商網絡轉變，一大批新興的華人工業企業和農工貿企業集團也隨之先後出現。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國政府相繼實施新經濟發展戰略的時候，東南亞各國華人採取了與自身命運和前途攸關的重大步驟：加入所在國國籍，成為所在國公民。各國華人企業，也因此而更加主動地把自己的活動納入國家的發展規劃之中，許多華人資本還與當地國有資本或原住民資本相結合，走進國際市場，形成強大的跨國集團。這樣，東南亞各國華人經濟從內容到形式已完全成了所在國經濟的組成部分，各國華人資本也成為所在國的民族資本重要成分，而各國華人之間的網絡的性質，在其功能轉型的同時也發生深刻的變化，從原來中國公民間的經濟聯繫變成為東南亞多國公民之間的經濟聯繫，這種在當地紮下根，本土化了的華人網絡聯繫在促進東南亞各國經濟的發展和東南亞區域經濟的整合方面便日益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sup>11</sup>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兩個陣營長期對峙，東亞經濟一直處於隔裂狀態。1978年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後這種狀態開始改變。1985年美元的自由浮動，日元的升值，工資和成本的日益高昂，使得日本和四小龍製造業難以為繼，紛紛設法將工廠轉移到勞動力便宜的地方。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化，無疑對他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大陸與這些國家和地區在政治制度和經濟體制上仍存在較大的差異，許多事情一時不易達成官方的協定，港、台中小資本便利用華人之間的關係，透過民間的網絡設法將資金、設備和技術引進大陸，促進了台港澳和大陸經濟的高速發展。東南亞華商也不甘落後，紛紛以香港為據點，利用華人商貿網絡打入中國大陸市場。<sup>12</sup>九十年代以來，香港、臺灣和新加坡華人資本也開始透過華人網絡把大量資本和設備轉向越南，緬甸等正在開放的其他東南亞國家，加速這些地區的整合。

東亞、東南亞經濟高速持續發展，特別是中國市場的開放引起全球各國的關注，北美和歐洲各國為了進一步開拓亞洲市場，開始重視華人網絡的運用，東南亞一些大企業集團也開始走出亞洲，於是從七十年代末以來，東南亞和港臺各地便先後出現了60多個世界性的地緣組織，血緣組織，業緣和其他類型的華人社團；從九十年代起，由新加坡發起，每

---

1980) .p. 95; Wu Yuan-li, "Chinese Entrepreneurs in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3, no. 2 (1983): 112-117.

<sup>11</sup>參看丘立本“對東南亞華人資本的再認識”，《世界華僑華人經濟研究：世界華僑華人經濟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第44-47頁。

<sup>12</sup>如泰國的正大集團，馬來西亞的郭鶴年集團和豐隆集團，印尼的沙林集團和力寶集團等都在香港建立國際總部，與國際金融市場建立聯繫並向中國市場進軍。泰國正大集團目前已成了在華投資最多的東南亞華人集團之一。汪慕恒主編《東南亞華人企業集團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第20頁。

兩年在世界各地舉辦一次的世界華商大會, 試圖把東南亞華人網絡和原來處在半隔離狀態的歐美華人網絡, 以及港、台和中國大陸華人網絡聯接起來。<sup>13</sup> 這就是今天東南亞華人網絡的基本狀況。

從以上簡要的歷史與現狀考察中可以看出:

- 第一, 現代華人網絡的出現是在西方資本國際化的背景下形成的。它與中國移民直接相關。現代中國移民雖是世界移民大軍的一個組成部分, 卻與歐洲移民在性質上有所不同。歐洲移民是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 也是歐洲向外擴張的需要。中國移民不是中國社會經濟正常發展的內在要求, 更不是中國資本主義向外擴張的需要, 恰恰相反, 它是中國資本主義不發展, 大量人口作為勞動力被捲進國際勞動力市場的結果。中國移民的這種性質和被動狀況決定了華人網絡的建立和擴展不但帶有被動性、自發性和自衛性的特點, 而且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 特別是英、美、日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網絡具有從屬性的弱點。那種無視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和網絡的存在, 看不到華人網絡這些重要的特點和根本的弱點, 過分強調其獨特性和優點, 甚至將華人資本說成“網絡資本主義”,<sup>14</sup> 顯然是有背基本的歷史事實而無助於問題的深入探討的。
- 第二, 家族關係和宗鄉組織在中國早已有之。它們並不具有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網絡作用和功能。這種作用和功能是在它們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後產生的, 而這種作用與功能的發揮尚須具備一定的歷史條件和機遇。顯然, 離開資本主義時代的特點, 不對歷史進行具體分析, 過分強調中華傳統文化特點和優點, 是解不開“華人網絡之謎”的。
- 第三, 華人網絡既是建立在以地緣、血緣為紐帶並依靠傳統文化來維繫的人際關係之上, 它便具有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兩個方面。華人深受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 家族觀念較深, 對家庭有責任感, 信任親屬, 這是華人網絡的確定性一面, 然而, 家族親屬人際關係本身並不等於經濟網絡, 它可以是經濟網絡也可以不是經濟網絡, 即使是經濟網絡其經濟意義和價值也可以有所不同, 這一切並不取決於家族人際關係本身而是由外在諸多因素決定的, 這就產生了不確定性一面。由於客觀上存在著這兩個方面, 人們仔細觀察時就會發現, 實際上存在著三種不同的網絡, 一種是過去存在過現在未必有多大意義的網絡, 一種是現在正在發生作用的網絡, 還有一種是現在雖還不是, 但將來有可能是網絡的潛在網絡, 必須把三者嚴格區別開來, 才能比較客觀地反映現實。那種認為當前存在一個全球性的“華人共同體”(Chinese commonwealth) 的說法, 忽視了網絡的不確定性一面, 將三者混為一談, 因而言過其實了。<sup>15</sup>
- 第四, 華人網絡並非固定不變, 它隨著時間推移而發生了兩方面的變化。其一是網絡的規模和範圍的擴大。即從方言群擴大到整個華人社會, 從國別擴大到東南亞地區進而至於東亞和世界各地。華人網絡的擴大, 就東南亞而言, 並不都是華人經濟發展的結果而是和移民, 再移民直接關聯的。後者與前者一樣, 在相當程度上仍是外部壓力所致, 如戰後印尼、越南華人的再移民就是最好的例子。顯然, 這和英、美、日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經濟勢力到達那裏, 經濟網絡就擴大到那裏是不能同日而語的。其二是網絡的主體——華人的國籍

<sup>13</sup> 1995年12月6日在曼谷召開的第三屆世界華商大會上新加坡代表團宣佈由李光耀提倡的“世界華商電子網絡”已建成聯網啓用。《亞洲週刊》, 1995年12月17日。

<sup>14</sup> Louise do Rosario, “Network Capitalism”,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 Dec (1993).

<sup>15</sup> John Kao, “The Worldwide Web of Chinese Busines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rch-April (1993): 24-36.

身份變化引起的關係實質的變化。東南亞華人國籍身份的改變意義十分深遠。許多人誤以為這只不過是法律形式的變化，不反映華人觀念的重大變化，也不影響華人的經濟行為。其實不然，東南亞華人加入了當地國籍，成為所在國的公民。這不僅是對“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的傳統觀念的突破，而且清楚地表明，他們已經決心融入當地社會，把自己利益、前途和命運與當地居民緊緊連在一起。因此，各國華人間的網絡聯繫已從中國公民之間的經濟關係發展為具有不同國籍的華人之間的經濟聯繫。正如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的英格魯撒克遜人之間的經濟聯繫是他們所在國經濟聯繫的一種特殊形式一樣，東南亞華人間的網絡聯繫也是東南亞各國間經濟聯繫的一種特殊形式。並不存在獨立於東南亞各國經濟之外的東南亞華人經濟。一些學者雖然承認東南亞華僑加入當地國籍後成了華人這一事實，卻沒有從這種變化中得出應有的結論，反而片面強調他們與世界各地華人在民族、語言、文化上的共同點，把已是反映東南亞各國間經濟聯繫的一種特殊形式的華人網絡聯繫說成“華人經濟圈”或“大中華經濟圈”，他們的這些提法，違反變化了的客觀事實，對當地華人和所在國的經濟發展不利，遭到東南亞華人學者的批評是理所當然的。<sup>16</sup>

第五，隨著歷史的發展，華人網絡的開放度是逐漸提高而不是相反。這是因為：(1) 這個網絡本是由散居各地的華人自發建立的，它憑藉傳統的家庭和文化紐帶來維繫，並非某種政治上的安排，也沒有一個統一的中心，支配他們活動的只是市場的力量；(2) 在東南亞各地華人加入所在國國籍後，這個網絡更成為多國公民所共用；(3) 新一代東南亞華人企業家多通曉當地語言和西方語言，具有多元文化的素質和開闊的視野，因此，正如一些學者所說的，華人網絡猶如“互聯式電腦網絡”，具有“開放結構”，<sup>17</sup>可以為各方面的人士所利用。這一點不僅華人懂得，日本，西歐，北美的企業家和東南亞當地的企業家也都懂得，他們正在利用華人網絡開放性的特點打入中國市場。“華人經濟圈”的提法，給人以封閉和排外的印象，與華人網絡開放度高的事實不符。這也是這種提法不受歡迎的原因之一。其實，比起依靠國家的支持，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來，並實行集中領導的日本人的網絡即所謂“系列”來，華人網絡顯然要開放得多了。<sup>18</sup>

第六，華人網絡的具體功能，從根本上說，在殖民地時期，主要是發揮華人企業“仲介商”的作用，適應於戰前世界資本主義積累方式和宗主國與殖民地間垂直分工的結構；在東南亞各國取得獨立後，則主要是發揮華人企業“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發展民族經濟”的作用，適應了東南亞各國現代化的需要和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積累方式的新變化，特別是七十年代以來中心與邊緣日益增多的水準分工的新特點。這兩種功能都是利用了華人對當地的專門知識，起一種黏合劑作用，“把發展中的經濟體與工業化的西方結合起來”。它也反映出華人企業至今仍存在的根本弱點，這就是日本學者吉原久仁夫指出的，在資金、技術方面嚴重依賴西方和日本。吉原把東南亞資本主義(包括華人資本)稱為“仿資本主義”(ersatz capitalism)引起學術界的爭議，但他指出東南亞資本缺乏自身的工業基礎，尤其在技術上嚴重依賴

<sup>16</sup>黃朝翰，“所謂大中華經濟圈還是少談的好”，[新]《聯合早報》，1994年11月19日；王賡武，“大中華與海外華人”，[菲]《世界日報》，1994年10月4日。

<sup>17</sup>約翰·奈斯比特，《亞洲大趨勢》(北京：外文出版社，1996)，第13頁。

<sup>18</sup>Lever Tracy, C & Tracy, N., "The Dragon and the Rising Sun: Market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Rivalry in East and South East Asia", *Policy,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 (1993), no.6.

美、日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這一事實卻點出了問題的實質。<sup>19</sup>在討論華人資本時忽視這一基本事實,不從本質上看問題,單純根據各地華人“資產總額”和“美元外匯”,“可動用資金”等數量的推測,把主要依靠所謂“知識套匯”(knowledge Arbitrage)獲利,屬於發展中國家的各國華人資本捏在一起,將它和擁有核能、航天與現代資訊高科技的政治經濟大國美國、日本和歐洲相比較,並宣稱海外華人已構成“世界第四經濟勢力”,這種誇大其詞,危言聳聽的說法,發人深省。<sup>20</sup>

總之,從世界歷史的角度,把東南亞現代華人網絡置於當代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和各民族網絡的歷史聯繫中考察就能發現:現代東南亞華人網絡並不是中國經濟與文化對外延伸的直接產物,而是世界資本主義席捲全球後,把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勞動力捲進國際勞動力市場的產物,因此,它不免帶有前資本主義色彩,具有被動性、自發性、自衛性和不確定性等特點以及對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從屬性的弱點。不過,中華民族必竟是一個具有古老文化和悠久歷史傳統的民族,它和猶太、印度等古老民族一樣,具有很強的適應時代的能力,能在具有相對優勢的地方顯示出它的活力。西方發達國家制度化的經濟網絡雖然有其先進之處,但的確有其局限性和自身的弊病。這就使得華人網絡有可能成為溝通西方與東方的橋樑,聯接發達工業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經濟的黏合劑。而華人網絡本身也具有相當大的靈活性,能適應時代的要求,不斷克服自身的狹窄性,從幫的網絡發展為多國公民共用的,多元文化的,開放性的網絡,因而能在促進東南亞和整個東亞經濟持續發展,加速區域整合中發揮作用。

基於上述的認識,我們可以對東南亞華人網絡的未來談點一般性的看法:

首先,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和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速是當今歷史發展的基本特徵。正像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科學技術革命的興起,交通電訊工具的運用縮短了歐洲與亞洲的距離曾賦予海外華人宗鄉組織新的內容和意義一樣,當今國際直撥電話、電腦網絡、超音速飛機等通訊運輸科技的普及必將賦予華人網絡新的內容和意義。

其次,東亞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和亞太經濟聯繫的日趨密切,將改變以歐美為中心的世界的格局。正像當年東南亞的具體形勢曾給了那裏的華人難得的歷史機遇一樣,當今中國的崛起和亞太經濟蓬勃發展的形勢又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遇,使他們可以在更加廣闊的天地裏發揮華人網絡的作用。

第三,隨著東南亞各國經濟的發展和華人企業實力的增強,華人網絡的建立和運用將越來越由被動轉為主動,由自發轉為自覺,但在東南亞各國尚未真正實現工業化之前,華人網絡的功能及其基本弱點仍將長期存在。

最後,華人網絡本身必將適應時代的要求而向著更加當地化,開放化的方向發展。它在吸收各民族優秀文化和科學技術新成果的同時,將保持和發揚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這不單純為了維持華人間的文化聯繫以便於進入中國的大市場,而是因為實踐證明,中華傳統文化中確有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優秀的遺產。因此,華人網絡在其發展中將不會全盤西化而會在傳統文化基礎上吸收其他文化的優秀成果,以實現自身的現代化。

<sup>19</sup> Yoshihara, Kunio, *The Rise of Ersatz Capitalism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sup>20</sup> John Kao, “The Worldwide Web of Chinese Business”: 24-36.

主要參考書目

- East Asia Analytical Uni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in Asia*, (Canberra: 1995).
- Cheng Lim Keak, *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Cushman, Jennifer and Wang Gangwu, eds., *Changing Ethnic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8).
- Goldberg, Michael A., *The Chinese Connection*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5).
- Kotkin, Joel, *Tribes: How Race, Religion and Identity Determine Succes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 Lim, Linda Y.C. and Gosling, L.A. Peter, eds.,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and Ann Arbor: Maruzen and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3), 2 vols.
- Mackie, J.A.C., "Changing Patterns of Chinese Big Business in Southeast Asia", in *Southeast Asian Capitalists*, ed. Ruth McVey (Ithaca: Cornell Southeast Asian Program Publications Program, 1992).
- , "Overseas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6,1; 41-46, 1992.
- , "The Ethnic Chinese Economy in Southeast Asia", *Report fo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21- 23 January, 1994.
- McVey, Ruth, *Southeast Asian Capitalist* (Ithaca: Cornell Southeast Asian Program Publications Program, 1992).
- Omohondro, John T., *Chinese Merchant Families in Iloilo: Commerce and Kin in a Central Philippine City*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1).
- Redding, S. G.,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Berlin & New Walter de Greuter, 1991).
- Somers-Heidhues, *Southeast Asia's Chinese Minorities* (Hawthorn, Vic.: Longman, 1974).
- Wu Yuan-li and Wu Chun-hsi,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e, 1980).
- Yoshihara, Kunio, *The Rise of Ersatz Capitalism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游仲勳: (日)《華僑——經濟網絡化的民族》(東京: 講談社, 1990)。
- 游仲勳: (日)《世界的華人》(東京: 西馬魯出版會, 1991)。
- 游仲勳: (日)《華僑如何改變亞洲》, PHP研究所, 1995。
- 野村綜研香港有限公司編: (日)《香港與華人經濟圈: 制約亞洲經濟的華人力量》, (東京: 日本能率協會, 1992)。